

底层写作：左翼美学的诗学正义与困境

周保欣

底层写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历史构成，但当代底层文学承续的却是现代以来的左翼美学传统，作家们在批判主义思维影响下，对“底层”的想象和书写是单极化的，存在唯物质叙事、泛苦难处理和沉迷“恶”的叙述等不良倾向。因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作家的底层叙述存在严重的“视点匮乏症”，导致讲述底层时的泛道德主义叙事姿态，主要表现在道德问题的社会化和社会问题的道德化。发展当下的底层文学，需要恢复和发展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力量，处理好作家创作思想中的批判和建设的关系，重建新的启蒙思想和视野，并在中国诗学传统中整合底层写作的美学思想经验。

一、批判美学与“底层”的单极化书写

底层写作并非当代特有现象，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起源和最具个性的特质。早在《诗经》时期，中国文学就有以国风为代表的底层文学和以雅、颂为代表的文人与庙堂文学。20世纪以来，在“启蒙”、“革命”、“救亡”等历史观念的笼罩下，文学书写中的“底层”形象被充分意识形态化，在启蒙主义的叙述视界里，它被当作人性暗昧和思想不觉悟的喻体在书写；在革命叙述的思想路线图上，它替代的是“阶级”、“剥削”、“压迫”等历史措辞，多被作为思想解放、阶级意识觉醒、革命、解放和翻身的神话在讲述。即便是沈从文那样的自由主义作家，在叙述乡村底层社会经验时，亦把它作为作家所批判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对应物，底层同样被别样的意识形态所扭曲。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接续的是现代以来的思想伦理经验和文学审美传统。底层其实是个自足的文化空间形象。在这个文化空间内部，包含着生活的全部，浓缩着社会、时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经验，它是幸福与苦难并存，黑暗与光明同在。底层当然可能包含着痛苦、不幸、磨难、沉沦、欺诈、不公等人生经验与社会伦理，但同时还应该包含着勤劳、智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伦理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及其经验反思”（06CZW01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文化矛盾与文学道德价值创新问题研究”（20080431332）系列成果

勇敢、诚实、创造、幸福等美好的一面。但由于深受20世纪文学主导性审美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下的底层写作,作家们往往采取单极化的书写方式来处理底层生活经验。说不准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误读,底层美好、光明的一面总是被作家们遮蔽了,作品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其中复杂的另面景象,而且是被极端处理的另面景象。这种特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唯物质主义叙事。在启蒙主义时代,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精神要求,要远远超出物质上的要求。独立、自由、个性和思想解放、人格尊严等,无不是当时作家们耐心演绎的叙述话语。但在当下的底层写作中,底层民众的思想存在和精神状况基本被过滤了,底层生活的物质性存在成为当代作家虚构和想象底层世界最重要的空间。尤凤伟的《泥鳅》、曹征路的《那儿》、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等这些年引起轰动性影响的作品中,作家们真正的用力之处,都在刻画和叙述底层世界物质生活的贫困方面,基本生存保障的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构成小说故事层面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冲突的主要根由。作家们的伦理诉求,多局限在民权、机会、社会公正、平等、正义等伦理范畴。并非说作家们所追问的这些问题就不重要,或者说这些作家作品就缺乏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描摹与洞察,而是如有些论者所说:“作家有必要将‘农民问题’或者别的具有现实性的紧迫性的问题转换成‘人的问题’。作家既要关注他的主人公的外在遭遇,更应当关注他们的精神和灵魂”^①。因为,只有真正地去关注人的灵魂和精神问题,并由此而触及对现实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才是文学的。但是当下许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启蒙时代作家们对人的灵魂与精神问题的关注,是试图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创造出革命的意识形态,那么,当代中国作家在底层叙事过程对人的灵魂与精神问题的消磁,转而以直观的、极端化的、惨烈的现象性物质主义书写代之,反映出的则是作家对“底层”想象的缺失和中国文学近些年淡忘精神书写的美学后遗症。

第二,泛苦难化处理方式。尽管底层生活的原始样态和道德形态是丰富复杂的,但当下作家在书写底层时,总是着力渲染底层生活的苦难。在许多作家那里,底层被处理成充满苦难特质的单一维度,似乎只要有“苦”,就足以表达底层;只要有“苦”,就足以表达农民、城市平民和下岗工人的生存状况。“苦”构成了底层生活的标签。作家们现实主义的叙事功力,主要就体现在对苦难事件、苦难的人物形象、底层卑微人物物质生活贫乏的抽丝剥茧式的精雕细琢和细致刻画上,而不是对历史、时代、生活和人性等的辩证把握。和物质主义叙事形态相关联的是,当代作家对底层苦难的理解,更多局限在物质性的层面,一个不变的叙述程式是:正是物质的匮乏,导致底层民众生存的不幸和艰辛,作品中的人物或死或疯或堕落或自杀或杀人,终归是在“钱”字上面。作家们陷入和现实的苦苦缠斗,他们对底层社会民众的喜、怒、哀、乐作过滤处理,似乎只要写到“抹布阶级”或者卑微人群,就只能有哀和怒而不能有喜和乐,就只能有因贫困而衍生的诸般苦难,而不能有安贫乐道、知足长乐的底层幸福或者人生满足感,更不用说像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等作家那样去写出乡村底层社会生活的野趣和情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天道人伦之乐了。

第三,“恶”的书写。在道德情感上,“底层”概念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同情、友爱、团结、合作、互助、怜悯、慈善等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美好德性,这些情感和品质,是人类的高贵、希望、诗意和尊严之所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难见到。但是反观当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更多的却是仇恨、愤怒、冷漠、自私、贪婪、虚伪、欺诈、敌对等情感,作家们似乎对人类那些美好的正面道德情感视而不见。在他们的创作中,作家更愿意通过官民、商民、城乡、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等一系列冲突,去展示人性的恶,揭露和抨击现实的黑暗。这个时候,

人类的善意、德性、希望隐匿不见了,恶、黑暗、绝望和毁灭牢牢地占据着作品的中心。每每写到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总是直指社会的不公和富裕阶层的不义。而在面对底层人物时,除极度渲染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 and 不幸遭遇外,传统文学视界中对民间底层社会勤劳、勇敢、朴素、奋斗、智慧、创造这些美好品质的歌颂,对劳动的诗意颂祷,对苦难的神意坚忍,却很难看到。作家们很少正面去书写作为现实存在的底层民众的自尊、自强,书写底层人物的人格尊严。

这样说并非要求作家去美化现实甚至粉饰太平,而是说,既然我们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对当下中国底层社会的道德关切,那么作家就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叙事伦理,那就是追求客观与真实。但眼下的作家,在左翼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斗争美学的影响下,他们对历史和生活的把握,并没有超出左翼美学传统。一方面,现代作家在民族的屈辱中培植出的道德怨恨情绪顺势流进他们的血液,导致他们“在写‘恶’、‘黑暗’的时候比较有力,但如何写出生活中的善、温暖和美好并使其可信,就显得苍白和无力”^②。道德怨恨和恶的历史动力学遮蔽了他们的审美目光,形成他们底层写作过程中的单极化书写倾向,难以对时代、现实、底层社会作出综合的全面的把握。另一方面,他们的叙述模式和左翼文学亦是大同小异。在现代以来的革命文学叙述中,底层的苦难与愤怒往往是作为革命讲述的铺垫来写的,不管《少年漂泊者》里汪中式的漂泊、流浪,还是《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出走与复仇,都是以“舍命”的反抗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的否定和对革命的肯定。而在当下的底层文学中,革命讲述不再具有叙事合法性,作家们悄然把现代以来的“舍命”/“革命”叙述模式置换成当下的“舍身”/“活命”叙事模式。举凡写到底层生活的贫困,就都会写到底层女子或下岗女职工沦为三陪或妓女养家活口这样的故事,比如《泥鳅》中的寇兰,《那儿》中的杜月梅,《我们夫妇之间》的淑英、李肇正,《姐妹》中的宁德珍和舒小妹,熊正良《谁为我们祝福》中的刘金娣等。“性”和“革命”构成两个时代具有文学史结构力的作家想象底层的基本方式,构成两个时代作家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叙事狂欢。话语悄然转换当中,铭刻着历史与时代的真实。

二、视点匮乏与泛道德主义

当代底层写作的困境,绝非单纯是遵从何种传统问题。相当多的论者在分析当前底层写作存在的问题时,都指出作家中产阶级化带来的身份位移,及其与底层社会的生活思想经验隔阂,是当前底层写作模式化、观念化和流于表面的原因。这种分析自有其道理。但经验层面的事实仍然不是作家处理底层叙事失当的深层缘由,根本还在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形成的特殊审美思想意识、价值心态和伦理取向的偏差。提到底层写作,我们很难绕过俄罗斯文学。或许我们对托尔斯泰对“人民”宗教式的负罪感,对乌斯宾斯基的“土地——人民性”的超历史道德力量不以为然,但俄国文学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坚决地站在自身的立场审视历史、时代和人民,才使他们的作品获得对民间、底层、人民的独特判断,建立起表达底层、人民的诗学途径。

俄国作家的幸运却是中国作家的不幸。和西方社会不同,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知识族群并非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发展出自身作为独立社会阶层的职责、立场、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他们总是在进与退、仕与隐、君与民、庙堂与江湖、贵族与平民之间逡巡,他们的职责意识和价值取向,总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如此,中国的知识阶层一直没有处理好如何讲述底层的问题,他们缺乏独立的、自足的讲述视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围绕“大众化”问题屡屡展开讨论而难有结果,症结大概就在这里。而反观文学

自身,无论是启蒙还是革命讲述,对于底层,作家们讲来讲去都难以绕开传统文化中的“主—奴”权力意识结构,启蒙文学批判的是国民的“奴性”哲学,革命文学承诺的是底层民众“当家作主”。这种意识结构,我们不难看到以反传统自居的现代文学知识分子,缺乏思想根基后向传统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回归。

这种讲述底层的视点匮乏症,在时下的底层写作中更加严重,因为在启蒙和革命时代,民主、科学、自由、解放等观念还可以为作家支付讲述底层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在今天,当启蒙和革命的讲述双双失效后,作家如何讲述底层,美学和思想视野就变得尤为重要。当下的中国作家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底层话题虽说是展示当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良知和道义的最好场所,但是如何通过展开底层话题培育自己的感悟力,借这些问题的刺激形成自己的理想,培植批判的心灵和健全的心智,目前中国作家还没有理出头绪来。正是如此,在目前的底层书写中,多数作家都捞起道德主义这根救命稻草,自觉不自觉地吧道德主义作为审视问题的基本视点,似乎占据着道德主义的思想高地,就天然地占据着发言的真理席位,就可以弥补作家作为发言者的视点缺席。这样,一种知识分子泛道德主义的思想暴力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而它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

一方面,是把社会问题做道德化处理。在底层这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元素相互纽结的复杂问题上,多数作家对底层现象缺少宏观把握和辩证分析,而是以道德批判凌驾其他问题之上,以道德主义话语形式取代对现实生活的整体分析。相当多的作家都把底层贫民抽象的生存权作为绝对的道德命题放置在作品的中心,以生存权绝然不可侵犯作为批判的逻辑起点,展开对现实和社会问题的批判,而绝少对生存权与现实、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度关联作立体探讨。尤凤伟的《泥鳅》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小说叙写一群像“泥鳅”般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农民工进城后的遭遇,但作品的主旨并非表现民工坚韧顽强的生存力和生命力,而是书写“泥鳅”的卑微和毁灭。围绕着“毁灭”这样的叙事预设,小说叙写了国瑞们的命运悲歌,他们进城,既是盼望着“好歹留在城里,没准哪一天就会得到机遇”,亦是出自对乡村“荞麦地里打死人”现实的绝望。乡村的现实恨,迫使国瑞们进城,但进城后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机会,“见了你们这号人就犯恶心”的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他们遭遇到诸般歧视、侮辱、欺骗、利用、背叛。他们带着美好的梦想走进城市,却在梦想的破灭中走向毁灭。小说中的人物寇兰被逼卖淫,蔡毅江致残后摇身变成黑社会老大,小解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抢劫后做起合法生意,王玉城出卖良心作卧底,被愤怒的工人殴打致残,国瑞被卷进融资骗局,最后被送上刑场。这些“泥鳅”们因绝望而寻找希望,但希望本就并未对他们敞开,他们只好再度陷入绝望,在绝望里走向毁灭。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绝境”构成“泥鳅”们的生活本质。在这样的绝境里,任凭国瑞们怎样努力、挣扎,都是徒劳无益的。问题是,这种“绝境”虽然在作品中被作家作本质化处理,但是这种本质却是作家道德先验的产物,作家是在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结构中,讲述着“泥鳅”们的故事。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泥鳅”们的一切命运,都是直奔“毁灭”这个叙事目标去的,有了这样的叙事预设,他们的毁灭是正常的,不毁灭倒是有些不合情理。这种道德主义的先验逻辑结构,和早些年的“主题先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把历史批判置换成道德批判而已。而在审美效果和读者的阅读接受上两者却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阶级论的历史批判更多是观念的、符号化的,而生存论的道德批判却是现象的、情感的。故而,像《泥鳅》、《那儿》这些底层小说发表后引起叫好之声,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另一方面,是把纯粹的道德问题作过度的社会化阐释。任何道德问题都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特殊产物,这没有错,但道德作为人类的文明形态,它毕竟具有自足的价值体系和判断,

因此,涉及到具体道德现象,我们应该把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还给凯撒。时下中国作家的底层书写,在判断某些道德现象特别是底层人物身上出现的道德现象时,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错位的“社会归咎”原则,对于人物出现的非正当性道德行为,作家很少从人物自身角度找原因,而是把所有的过错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黑暗,以此来强化道德批判的合理性。

这种泛道德主义审视眼光,问题不在于它搅混社会问题与道德现象的界限(实际上两者是分不开的),而在于它以先验的叙述预设导致作家道德探索上的迷误。在叙述底层的过程中,作家们自然而然地站在底层、弱者的立场上,以代底层立言、维护底层利益、伸张社会正义自居,因而有意无意间形成“贫穷即正义”这种偏颇的道德认知方式。似乎只要是贫困者,只要是弱者,就不证自明地拥有道德上的正义感,就具有比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更多的德性。作家们在思想情感上承续着现代革命中的“为富不仁”、“贫穷即美德”的理念,美学上复活了革命文学传统中的“审富”心态。同时,作家对社会的整体认知,对人性的审美批判也存在着某种偏斜。在对社会、现实、权力、经济等外部环境展开批判时,他们的态度是彻底而坚决的。但在面对底层民众的人性弱点、思想局限乃至过错和罪恶时,却颇多犹豫含混。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以乡村护林员和看坡员吴响对一桩命案的追踪,揭示当下中国乡村底层社会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农村基层权力运行方式。在吴响追踪尹小梅死因过程中,作家对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当代农民习惯性的忍气吞声、麻木不仁、人格和人权意识的不觉悟是有所揭示和批判的,但是就个体而言,作家的情感态度却很可怀疑,作家批判的重心显然放在农村基层政权对民众生命的漠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官相护、权钱勾结等方面,对尹小梅和吴响这些主要人物,却缺乏必要的省察和批判。尹小梅明知草场不能放牛,却置禁令不顾,最后被关押到乡政府不明不白死去;吴响作为护林员,以权谋私,每次捉住女人们私进草场,他都以女人“脱裤子”作为交换放人。对于尹小梅来说,错可以有轻重,尹小梅错不致死,但对吴响来说,罪与恶就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了。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吴响手中有芝麻粒大的权力,就可因私废公、搞权色交易,如果他手握重权,吴响会是怎样的人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作家在塑造吴响这个人物时,却是把他喜欢“搞女人”作为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在写的,对他的权色交易,亦是在性格和个性层面来把握的,还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作出有力批判。

当代作家叙述底层的这种视点匮乏症,我们可以通过作家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叙述方法的确立方面得到证实。在现代启蒙文学关于底层的叙述中,不少作家都有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人的小说,而且小说中的叙述人“我”往往就是指代作家自己,或至少是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视角展开叙述的。不管作家坚持何种判断,作家在作品中敢于大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价值和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像鲁迅的《故乡》、《祝福》等。而在当下的底层写作中,作家们基本上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即便是使用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和作家自身叙述口吻亦大相径庭,像《我们夫妇之间》的“我”是丈夫角色,《那儿》中叙述“小舅”故事的“我”,是报社的记者,《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的叙述人“我”是家庭最小的儿子等。虽说不能据此就确认当下作家叙述底层的自信力不足,但作为一种症候,它所征兆的时代思想和美学信息,的确耐人寻味。

三、底层写作的前景与出路

底层写作对于中国文学具有特别意义,不仅关涉中国文学悠久的美学传统,还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现实相关。从目前的情况看,应当承认作家们写作的严肃性,但是我们同样有理

由怀疑不少作家的“跟风”恶习,如同某些评论者所说:“一些作家,未必有真诚的‘底层关怀’,却因‘题材热’、‘政治正确’挤进来……致使大量质量粗劣的‘底层文学’充斥版面”^③。如何调整和发展当下中国底层写作,如何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来审查和思考当前底层文学创作的现状、问题和出路,值得我们深思。毕竟中国文学的深厚积累,世界文学的丰富经验,现代以来有过的教训,已经为这种审查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场域,我们需要在这个场域中参照、借鉴、咀嚼、反刍、消化、吸收,融创出底层文学创作的新机。虽说很多命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这不妨碍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对某些命题作出必要的清理和思考。就当前底层写作而论,我认为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第一,恢复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力量。

并非说底层文学就必须坚持现实主义,而是说现实主义曾经是中国底层文学的伟大精魂。《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等等,就是这种精魂的切实体现。20世纪,由于深受既定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现实主义显得有些面目可疑,但这并非现实主义自身过错,而是作家对“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理解偏差导致的艺术实践失败。在今天的底层文学写作中,作家应当避开历史上现实主义曾经有过的迷误,在当下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促进和发展现实主义,使现实主义达到苏联艺术理论家苏契科夫所期望的“人生伟大的史家,人类的特殊的记录,人的思想和感情、希望和筹画的容器”的境界^④。在底层文学中恢复和发展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力量,作家们首要的就是应当坚持公正地对待世界、平等地审视底层、客观地描述生活。目前的底层文学创作,作家们最缺少的恐怕就是公正、平等与客观。他们对底层与非底层、社会与人、城市与乡村、贫民与富者等,并非在同样的情感和价值平台上展开叙述。在叙述社会外部环境和富裕阶层时,作家往往义愤填膺,而在叙述底层平民时,则充满包容和宽宏大量。许多小说中,作家对底层民众、弱者形象的描述和刻画可谓有血有肉,而在处理对立人物形象时,苍白而空洞,往往一“恶”了事,缺乏性格的柔韧性和层次感。有鉴于此,我认为作家必须处理好现实情感和文学情感的关系。现实主义拒绝偏见,但不拒绝主观,现实主义同样需要作家主体性的思想和情感的介入,但这种思想和情感必须是独立、自由、公正、平等的,这是文学情感与现实情感的真正区别所在。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对底层弱者抱有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必须以文学情感方式来处理生活和人性,节制现实情感,作家的感情只能溶入在语言、人物形象塑造和生活细节的刻画中,通过形象创造寄寓作家的情感和思想,而不是以先在的情感和思想去对生活加以改写。

第二,处理好批判和建设的关系。

和现实主义要求相统一,当下的底层写作,作家应当辩证地而不是片面地对待人类社会和底层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虽说批判是文学的功能,但绝非文学的惟一功能和最终目的。作家不能为批判而批判,为否定而否定,而应当把批判和否定建基在建设性和追求肯定性价值方面,在否定中求得肯定,在批判中求得建设,协调和平衡处理好创作意识中的批判与建设的关系,从而真正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前沿,创作出具有深刻思想洞察力和丰富时代表现力的优秀作品。因此,当下的底层文学作家应当把握好两个原则:其一,是同情地理解历史的主流性原则。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因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底层民众的确处在弱势阶层,这当然是需要同情的。但在同情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底层民众——“人”的苦难和不幸的同时,作家同样需要同情地理解“历史”,需要认识到当下底层社会存在的诸多消极、腐朽现象,既有人为的偶然性因素,更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因素。许多问题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时代阵痛无不牵涉到历史

的隐痛,每种社会和人生现象,都暗含着文化变迁的风雨沧桑。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只有抓住时代的主流,才能对当下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作出辩证的分析把握;只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发展,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作家们才能真正地实践现实主义的美学主张,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其二,与现实高度统一理想性原则。如加缪所说:“没有一部真正的作品不在结尾给每一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某种内在的自由”^⑤。当下的底层文学作家,在对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对现实人类的心理痼疾做尖锐批判时,理当注意到,不管我们的社会和现实人类存在何种问题,作为人类,我们都有不可摧毁的信念和希望,作家必须对人怀有敬意和信任,写出人类的正面价值情感。正如鲁迅发现“铁屋子”意非直指人类失去希望,而是考量有无打破它的可能,真正优秀的按照人道主义写作的作家,决然不会只取批判、破坏、否定,而彻底取消建设与肯定。因此,在创作中,作家应当着眼于建设,去发现内在地包含在人物真实生活和生命形态中的自由意志、创造性激情,去发现存在于人物生命理解中的希望、信念、爱和美,以作家对真、善、美的理解,启示和指引人类对真善美的热爱和追求。这样的文学,是温暖而充满善意的,这样的作家,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作家。

第三 重建新的启蒙思想视野。

现在重提底层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启蒙视野,并不是说作家必须建立起知识分子言说的文化合理性,况且这种文化合理性并非朝夕可建,而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审视底层问题的基本视野。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底层写作作为文学存在的基本价值和我们的特殊时代精神问题,为何言说底层,如何言说底层,都需要在文学基本价值和时代精神这两个基本框架内进行。这里,我很难就文学基本价值和时代精神作出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但是我想,人类的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都应该构成它们的轴心思想,这是文学和人类文化建设的根本要义所在。在这一切未能得到最终实现的时候,启蒙就是未竟的事业。因此,无论我们把理性主义、个性主义当作启蒙的哲学基础,还是把“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视作启蒙的最后纲领^⑥,启蒙都是文学的重要课题。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理应回到这个根本道路上来。作家应当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价值引领文学创作。当代中国处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围绕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幸福与和谐。和“人”相比,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只不过是人的合目的性的再造物,因此,人的价值是作家衡量和评判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轴心价值。同样,作家还应当对人的精神状况和文化性格做深度打探,对人类的心灵问题作尖锐剖析和诊断。但是很显然,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做得很不够,他们过度关注的是底层人物的物质性存在,忽视或者忽略他们的精神性存在。他们以片面的人道主义姿态同情、怜悯着“底层”,社会的批判压倒人生批判,很少像鲁迅那样尖锐地解剖底层社会的人性病痛。他们的作品染上浓厚的“社会问题小说”特点,却少些“为人生”和“人的文学”的旨趣。

第四 在中国诗学传统中整合底层写作的美学思想经验。

底层文学毕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因此,我们在考察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时,底层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性、传统性和“中国性”是应该适当加以考虑的。若以传统底层文学作为观照视角,当下的底层文学创作,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底层”表述的中性化问题。在传统文学视界里,“底层”虽有社会等级意味,但总体而言却是中性的社会学表达,然在20世纪的文学叙述语境里,“底层”被别有意味地塞进过多历史、政治、经济、道德等内容,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魅力。当“底层”作为中性概念存在时,底层文学似乎就是只关涉底层生活和底层情感的文学,而当“底层”被政治化、道德化后,底层本然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情状往往被某些观念

篡改成为观念符号。当下的底层写作,如何对“底层”作意识形态的消磁处理,使其更显生活化内容,值得我们考虑。其二,是底层写作的主体性与“纯文学”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作家”身份的独立性不强,故民间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获得和文人文学鼎足而立的机会。但在当下语境中,在“纯文学”观念的支配下,底层文学的主体已经被置换成知识分子,即便有底层写底层的作品,如果不符合现有的“纯文学”理念、范式甚至传播方式(公开出版和发表),也很难被纳入“文学”范畴。在这种“纯文学”对底层原始写作的压抑中,类似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曲乃至其他样式的底层创作,不仅现在,恐怕将来都很难被接纳,而类似“打工者文学”这类的作品,往往亦多在网络或地摊上传播和流行。当底层被隔离在“文学”门槛之外时,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底层社会的辉煌艺术创造,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即将断流,而底层创作的审美精神、情感意志等同样很难借助文学表达出来。因此,今天我们可否以开放的“文学”观念来重新审视底层的艺术创作,这是另一个待解的问题。其三,是底层写作过程中“底层性”与“知识分子性”的价值共通问题。从文学传统来看,民间性的底层文学和文人创作,历来存在着题材选择、叙述立场、动机、风格、修辞等方面的不同。民间底层社会自有民间底层社会的生活、思考和情趣,故民间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自有其独特意蕴和风格,朱熹说风诗“多男女相悦相念之辞”,意即在此。而文人文学的底层叙述,情感逻辑上不外忧叹和同情,道德姿态难脱知识者的自我优越感,因此,两者的“隔”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分子自说自话式的底层写作,究竟需要与否、能否得到底层社会的认同?至少从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来看,“大众化”、“民间化”、“口语化”等运动的频繁上演,说明就需要而言,是无可争辩的,但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能否得到底层认同,的确是个问题。因为,两者的“隔”并非仅仅是形式美学与接受问题,而是与两种社会阶层的思想、情感、价值差异等密切相关。所谓“雅俗共赏”,如若仅仅出自形式因素思考,而不考虑思想、情感层面的共同美和共同善等,则很难真正达到“共赏”。但是,20世纪我们所做出的文学民间化努力,要么纯粹定位在艺术形式层面,不考虑思想和情感问题,要么是要求知识分子彻底地放弃自我,做群众的学生接受再教育,强调的都是两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从来没有把底层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价值共通性问题拿出来考虑。所以,即便是赵树理的“代农民立言”,或者如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所确立的仍然是以遮蔽和压抑某方面的存在为主导的叙事方式,还没有接触到两者的价值共通性问题。而无论是遮蔽、压抑底层还是放弃知识分子的自我立场,都不是打通底层和知识阶层价值共通的最好出路,最终也难以建立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底层社会话语的视界融合。这一点,是当下底层文学需要作出反思的。

① 参见曹文轩、邵燕君主编《2006年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③ 转引自柳鸣九主编《20世纪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④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⑤ 陈离:《“泥鳅”为什么没有能够抵达它向往的地方》,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⑥ 参见《值得期待、前程远大的文学生力军——“文学湘军五少将”创作研讨会综述》,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5期。

(作者单位 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 陈剑澜